

# 毛泽东著作在韩国的翻译出版研究\*

齐晓峰

**【内容提要】** 本文按照书籍史的研究方法，对毛泽东著作在韩国的翻译、出版、发行的历史与特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毛泽东著作在韩国的翻译出版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韩国在政治上与中国敌视和对立，排斥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著作被列为禁书，处于出版空白期；20世纪80年代，在民主化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推动下，韩国兴起了毛泽东翻译热；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作为专业学术研究的毛泽东著作翻译、出版和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总体来看，韩国虽然也有将毛泽东的著作列为禁书的特殊时期，但对毛泽东著作和思想的积极译介和传播仍是主流，这是历史文化因素和时代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毛泽东 海外传播 国外党史资料 中韩关系

**作者简介：**齐晓峰（1975-），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89）。

关于毛泽东著作在韩国的出版情况，目前国内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例如，李大可、全炯俊的两篇文章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毛泽东著作在韩国的翻译出版情况<sup>①</sup>。但迄今为止，按照书籍史的研究方法系统研究毛泽东著作在韩国翻译、出版和发行情况的成果尚不多见。所谓书籍史的方法，指的是通过对图书的翻译者、出版者和发行者进行社会学研究，探讨该图书的思想内容与时代和社会背景之间的互动关系<sup>②</sup>。根据对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在线编目联合目录（OCLC Worldcat）、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韩国国会图书馆、韩国学术研究情报服务（RISS）数据库<sup>③</sup>进行数据检索和资料查找，参考民间收藏信息和中韩两国学者已有研究成果，本文拟对毛泽东著作在韩国翻译、出版、发行的历史与特点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

1945年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结束后，毛泽东著作开始在朝鲜半岛零星翻译出版。经初步搜集，截至1948年8月大韩民国政府成立，共出版毛泽东著作十余种，其中《论联合政府》至少有4种译本，《新民主主义论》有3种译本<sup>④</sup>。毛泽东的这两部著作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在内容上对于当时朝鲜半岛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具有参考价值。当时的大部分译者是信仰社会主义的左派知识

\* 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中央文献中朝平行语料库的研制与应用”（20YYB010）、北京外国语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科研项目“基于平行语料库的《毛泽东选集》朝鲜语翻译研究”（YY19ZZB003）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李大可、〔韩〕全炯俊：《韩国八十年代出现毛泽东著作翻译高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5月28日；李大可、〔韩〕全炯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1980年代韩国的译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0期。

② 参见何明星、江蓝：《毛泽东著作日文版的翻译、出版和发行》，《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0期。

③ 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在线编目联合目录（OCLC Worldcat）可以检索到全世界2万多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是韩国的国家图书馆，韩国国会图书馆也是韩国首屈一指的大型图书馆。韩国学术研究情报服务（RISS）数据库是韩国最大的综合学术信息数据库，主要提供学术期刊论文、韩国各大学图书馆的馆藏书目以及韩国各大学与学位授予机构授予的学位论文等信息。

④ 另外几种毛泽东著作是《论持久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以及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

分子，也有个别主张民族主义的中间左派。可以说，当时对毛泽东著作的翻译是具有不同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在寻找建国途径和民族出路方面的探索和努力<sup>①</sup>。

本文按照时间顺序分三个阶段对毛泽东著作在韩国的翻译和出版情况进行梳理。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尖锐对立，这一阶段韩国一直处于浓厚的反共氛围之中，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出版进入长达30多年的空白期。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韩国兴起了民主化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带动了毛泽东著作翻译和出版的发展。第三阶段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毛泽东著作在韩国翻译出版的活跃势头也受到了影响；但1992年中韩建交后，韩国学术界对中国进行研究的热情持续高涨，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出版和相关学术研究作为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领域进入稳定发展阶段。中韩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具有悠久的交往历史，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与这种历史文化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 一、毛泽东著作在韩国翻译出版的空白期（1950—1979）

由于美苏冷战和20世纪50年代初期发生的朝鲜战争的影响，中韩两国曾长期在政治上敌视、经济上隔绝。整个20世纪50年代，韩国社会反共氛围浓厚，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处于空白状态。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关于毛泽东的学术研究开始复苏。1964年首次出版了以毛泽东思想为研究对象的专著——《毛泽东思想》（知文阁），该书作者金相浹历任高丽大学校长和国务总理等职务。该书多次再版，可以被视为韩国学术界开始研究毛泽东的标志<sup>②</sup>。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中美建交、中日邦交正常化等重大政治事件显示出的国际关系新变化，使韩国学术界进一步意识到研究中国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韩国政府开始在大学设立专门的中国问题研究所，开设中文系的韩国大学数量也持续上升。但是，由于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韩国处在朴正熙军人集团的统治下，对中国的研究还大多停留在对中国古代哲学、古典文学或中国历史的研究上，韩国大学中文系的专业设置中仍没有中国现代文学专业<sup>③</sup>。

纵观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虽然关于毛泽东的研究有所增加，但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仍处于空白状态。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研究毛泽东的成果中，部分成果积极追随官方的反共意识形态。与此同时，回避意识形态色彩、追求中立的学术研究价值的著作也有所增多。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以李泳禧为代表的正面评价毛泽东思想及其政治实践的声音明显增强，进入20世纪80年

① 在这一时期，1946年是毛泽东著作译介最为活跃的一年，共出版单行本近10种，1947年仅出版了1种。形成这种情况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随着1947年美苏冷战的开始，处于美军政统治下的朝鲜半岛南部虽然没有公开限制左翼图书的出版，但却不断强化对左翼知识分子活动的镇压。尤其是1947年8月11日，美军政以稽查“八一五暴动计划”为名，逮捕了大批左翼进步人士。这次事件后，朝鲜半岛南部的大部分左翼革命者“越北”去了当时由苏军控制的半岛北部。这样一来，进步图书的出版自然受到了影响。另一方面，1946年发行了很多左翼图书和小册子，其中大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著作的译本，读者对这类翻译书籍的需求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自1947年起本土作者的著作不断增加，翻译书籍出版量总体减少。参见〔韩〕李重渊（音译）：《解开枷锁的图书：解放期图书文化史》，首尔：慧眼出版社，2005年，第80、82-84页。

② 参见〔韩〕金相浹：《毛泽东思想》，首尔：知文阁，1964年。

③ 参见李大可、〔韩〕全炯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1980年代韩国的译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0期。

代后其影响进一步扩大<sup>①</sup>。另外，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对毛泽东的功过进行反思，这种反思的声音在韩国学术界关于毛泽东的研究中也有所反映，并被韩国官方用作反共意识形态宣传材料。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韩国国内民主化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越来越多韩国进步知识分子试图从毛泽东著作中寻求在思想和实践上应对韩国社会现实问题的有效途径<sup>②</sup>。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毛泽东著作翻译和出版的活跃期。

## 二、毛泽东著作在韩国翻译出版的活跃期（1980—1989）

20世纪80年代是韩国译介和研究毛泽东著作的活跃期。除汇编多人作品的译文集以外，该时期韩国至少翻译出版过11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和1种选集。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1980—1988年），韩国处于全斗焕的军事独裁统治下，反共氛围仍然十分浓厚，不符合政府审查标准的书刊经常遭到禁售或没收，发行人和译者被捕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sup>③</sup>。

### 1. 文学类作品

首先出版的毛泽东相关著作是传记和诗词等文学类作品。1985年3月，韩国协力（Dourei）出版社翻译和出版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名作《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sup>④</sup>，韩文书名为《中国的红星》，由洪秀原、安亮老、慎洪范翻译<sup>⑤</sup>。当时由于面临政治审查，出于保护译者的考虑，该书第一版没有署译者姓名。该书一出版就被禁止销售，后经过出版社反复抗议和争取才被解禁，其后又经历了多次“被禁—解禁”的过程，直到1995年再版时才正式标上了译者姓名<sup>⑥</sup>。

① 参见李大可、〔韩〕全炯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1980年代韩国的译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0期。李泳禧生于1929年，媒体人、学者、社会运动家。1972年至1995年执教于韩国汉阳大学，1976至1984年被朴正熙和全斗焕政权先后四次罢免教职，五次被捕入狱。代表性作品有《转换时期的论理：亚洲、中国、韩国》（1974年）、《与8亿人的对话》（1977年）、《偶像与理性》（1977年）、《超越分断》（1984年）、《越南战争》（1985年）、《逆说的辩证》（1987年）、《自由人、自由人》（1990年）等。李泳禧对毛泽东的研究成果几乎全部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在《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一文中达到顶峰。在韩国思想界，李泳禧是作为毛泽东的拥护者和毛泽东思想的传播者存在的，他的“中国研究开拓者”地位和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韩国社会变革运动中的“思想导师”地位都基于此，1977年因《偶像与理性》和《与8亿人的对话》违反《反共法》入狱两年的原因也在于此。参见李大可、〔韩〕全炯俊：《鲁迅在韩国社会变革运动中的接受方式——以李泳禧为中心》，《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6期。

② 参见李大可、〔韩〕全炯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1980年代韩国的译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0期。

③ 1982年2月韩国政府允许《卡尔·马克思——他的生涯和他的时代》一书出版，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实际上，当时韩国政府实施这一政策的目的在于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进行批判，使公民的反共意识更为成熟”。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韩国在一个月后就出版了15种意识形态批判类书籍，这些书籍迅速登上热销榜，引起了韩国各界的关注。1984年，《今天的大陆》等“有关中共”的书籍也被允许出版。但是，从1985年开始，韩国政府当局认为“很多出版的书籍对左翼理念无批判地介绍和接受”，又开始出台没收和禁止销售相关书籍的规定，并于1985年5月1日没收了“广场书籍”书店里陈列的图书665本。在这种现实条件下，为了尽量减少政府当局的强硬措施对出版界的负面影响，1986年8月韩国出版界的行业协会——大韩出版文化协会——内部设立了“理念图书出版特别研究委员会”，并承诺该委员会将履行行业监督职责，“不以出版自由为名使宣传共产主义和左翼思想的理念图书出版正当化”。参见《大韩出版文化协会40年史》，首尔：大韩出版文化协会，1987年，第257、261-262页。

④ 这部纪实文学作品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以及以毛泽东为首的许多红军领袖和将领的情况。1937年在伦敦首次出版，1938年在美国出版修订版，其后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成为著名的畅销书。其中文版译名为《红星照耀中国》或《西行漫记》。

⑤ 三位译者均为资深记者：洪秀原曾任韩国最早的通讯社——合同通信社（Hapdong News Agency）和《京乡新闻》的记者，曾担任《韩民族新闻》的评论委员和编辑部委员长；安亮老曾担任韩国记者协会编辑局局长；慎洪范是《朝鲜日报》外信部和文化部记者，曾任《韩民族新闻》评论员。

⑥ 该书于2013年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发行了修订版，修订版中人名地名改为根据现代汉语音译。

《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第四章“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诞生”，是毛泽东关于自己前半生的自述，被普遍认为是由毛泽东口述、斯诺笔录的《毛泽东自传》。在此基础上，1985年6月，平民社<sup>①</sup>出版了韩文版的《毛泽东自传》，译者为申福龙<sup>②</sup>。该译本在附录部分增加了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研究的两篇学术论文：一篇是赵在瓘和申福龙合写的《毛泽东的民族主义》<sup>③</sup>，另一篇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白鲁恂（Lucian W. Pye）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体现了毛泽东著作韩文译本对学术性的重视<sup>④</sup>。

在韩国翻译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作品现有7种译本，其中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有4种。最早出版的是1988年9月善琮图书出版社的《毛泽东诗选》，由李秀雄翻译。李秀雄为韩国建国大学教授，是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专家，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著述颇丰，对中国现代文学如何反映社会以及毛泽东的政治文艺思想研究也有一定造诣<sup>⑤</sup>。该译本是韩汉对照本，选取了毛泽东的代表性诗词作品36篇，每一首词的后面还增译了一首同一词牌名的知名词作，比如在毛泽东的《如梦令·元旦》后面翻译了李清照的《如梦令》。

1989年3月，《毛泽东诗词》的另外3种韩文译本几乎同时面世。第一种是记者兼作家姜俊埴编译的《诗与政治——毛泽东诗集》，由达达出版社（Dadabooks）发行。该译本的原书是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每首诗词的译文后面都附有原文、译者注和译者对诗词内容与创作背景的解读。如书名所示，该译本强调从政治角度对毛泽东的诗词进行解读。第二种是韩国延世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评论家柳中夏编译的《井冈山——毛泽东诗词集》，由平田（Pyeongbat）出版社出版。每首诗词的译文后附有原文和译者注，全书的结尾部分附有译者的解读性文章——《井冈山》。文中指出：“之所以选择这一书名，是因为中国革命基于农村根据地的土地改革，而井冈山是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sup>⑥</sup>这一译本强调毛泽东诗词在革命的叙事性之外的文学艺术特点，突出了作为思想家、革命家的毛泽东对文学的喜爱。第三种是中国外文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毛泽东诗集》朝文版在韩国实践文学社的重新出版，韩文书名是《毛泽东诗集：走过的路两万里》。中国外文出版社的原版没有分章节，韩文版则分成了“在长沙”“大长征”和“革命的完成”三部分，并在正文后面增加了韩国学者李胜敏（音译）的解说性文章《诗人与革命家》，对书中把毛泽东的诗作分为三个时期的原因、各个时期的特点和代表性诗作进行了详细的说明<sup>⑦</sup>。

## 2. 思想类著作

1989年是毛泽东著作在韩国出版发行数量最多的一年，除上述3种毛泽东诗词作品外，还有5种单行本和《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上册出版，另有2种编译文集里收录了毛泽东的作品。与之前聚焦文学类作品不同，1989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大多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体现。

① 平民社成立于1976年，是出版人文、社会、艺术类专业书籍以及各种文学作品的综合性出版社。

② 申福龙（1942-），韩国建国大学政治外交系教授。1980年任韩国政治学会理事，1994年起任独立运动辞典编纂委员会委员、韩国政治外交史学会会长等职务，在韩国政治史、政治思想史等方面著述颇丰。

③ 该论文原载于韩国学术期刊《中苏研究》1977年第2期。

④ 该书于2001年12月再版，第二版增译了《红星照耀中国》的第五章——“长征”。译者在序言中对增加这一章内容的原因进行了说明：虽然“长征”这一章不是毛泽东自己口述的内容，但对于理解毛泽东来说长征是非常重要的主题。另外，该书再版时删除了白鲁恂的论文，并插入了近80张照片，其中大部分照片在韩国是首次公开。

⑤ 参见〔韩〕李秀雄：《毛泽东的政治文艺思想》，《中国研究》1992年第11辑。

⑥ 《井冈山——毛泽东诗词集》，〔韩〕柳中夏编译，首尔：平田出版社，1989年，第121页。

⑦ 参见《毛泽东诗集：走过的路两万里》，首尔：实践文学社，1989年。

20世纪80年代是韩国社会的动荡转折期，社会主义思潮广泛兴起<sup>①</sup>。韩国国民对民主化的呼声不断升高，10年内发生了多次民主化运动，其中1980年的光州民主化运动和1987年围绕修宪展开的“6月民主抗争”最具代表性。进步思潮的兴起与出版界的繁荣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民众意识觉醒，对进步书籍的需求增加，从而推动了有深度的思想类和人文社会类书籍的出版；反过来，这些书籍的出版引领更多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民众投身民主化运动，形成了韩国20世纪80年代的民主变革运动高潮。

当时韩国社会各界进步力量的变革热情空前高涨，一些进步知识分子试图把毛泽东的思想和政治实践作为解决韩国社会问题的“他山之石”。而选择承担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工作本身相当于直接挑战官方意识形态，译者的翻译行为和发行人的出版行为也是对民主变革运动的直接参与。另外，1988年韩国首次举办奥运会，作为奥运会的主办国，需要邀请世界各国的选手参赛，这也促使韩国政府开始对此前严格的反共意识形态管制和审查政策作出改变<sup>②</sup>。在这种背景下，1989年成为大韩民国政府成立后出版毛泽东著作最多的年份。

1989年5月，论藏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文学艺术方面著作的合集《毛泽东的文学艺术论》。时至今日，这部著作仍是韩国集中译介毛泽东文艺论著的最具代表性的成果<sup>③</sup>。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民族民主革命和文化艺术”收录了新中国成立前的12篇文章，有的是全文翻译，比如《五四运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反对党八股》等，有的是摘录某一篇文章中关于文化艺术的部分，比如摘自《新民主主义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第二部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化艺术”收录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关于诗的一封信》《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新中国成立后的10篇文章。

该书的译者是韩国西江大学中国文化系教授、中国研究所所长李旭渊，他在“译者序”中阐明了其翻译动机：一是因为正确理解毛泽东的文学理论是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础，二是为了提供有效的经验，使韩国文学在韩国民族民主革命中发挥更大的作用<sup>④</sup>。译者在部分重要篇章前添加了专门的解说性文字，对编译目的、编译原则、自己对毛泽东文艺论的认识和读者阅读时需要注意的问题等进行了说明。译者还撰写了解读性文章《革命和文学的辩证法——中国革命和毛泽东的文学艺术论》，这是一篇关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总论性论文。李大可、全炯俊认为，该论文体现了译者“激进而审慎的左派立场”<sup>⑤</sup>。该书的附录部分翻译了1982年周扬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一要坚持，二要发展》。

1989年6月至7月，协力出版社出版了“协力文库”系列图书1—3卷，分别是毛泽东著作

① 到20世纪80年代，韩国经过20多年的产业化，城乡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阶层间贫富差距增大、教育资源和就业机会分配不均等社会问题加剧，但韩国政府仍然一味追求高增长、低分配，缺乏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在这种情况下，部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开始对体制产生怀疑，认为当时的韩国社会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主张进行社会变革或革命，发起了大规模的左派运动。参见李忠辉：《韩国20世纪80年代左派运动研究》，《改革与开放》2011年第18期。

② 当时韩国举国上下把主办奥运会看作民族荣誉，并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政府层面除了实施大规模的城市重建工作，也相应放松了管制。比如，取消了实行达37年之久的宵禁政策，目的在于通过恢复身体上的自由，放松国民被军事政权威压的心理。参见〔韩〕李重翰（音译）等：《我们的出版100年》，首尔：玄岩社，2001年，第286—287页。

③ 这本译文集是该出版社《文艺理论丛书》的第六本，根据中国大陆出版的《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毛泽东选集》（1—5卷，人民出版社，1966、1977）、《毛泽东选集》英文版（1—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67）以及《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等编译。参见《毛泽东的文学艺术论》，〔韩〕李旭渊译，首尔：论藏出版社，1989年，第12页。

④ 参见《毛泽东的文学艺术论》，〔韩〕李旭渊译，首尔：论藏出版社，1989年，第13页。

⑤ 李大可、〔韩〕全炯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1980年代韩国的译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0期。

《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延安文艺讲话·反对党八股》<sup>①</sup>。这种连续出版的方式更容易受到关注，从而使译著产生更大的影响。该套图书每一卷的卷尾都增加了2篇解说性论文，总计6篇，其中一篇是译者撰写的，其他是翻译的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的论文。第一卷翻译了李达的《〈实践论〉〈矛盾论〉解说》一书中的第一部分“《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础”，译者又撰写了解说性论文《〈矛盾论〉的历史意义》<sup>②</sup>；第二卷翻译了日本学者池田诚的论文《关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政治中的能动性问题》和林茂生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1919—1949）》一书第6章第1节关于新民主主义论的内容<sup>③</sup>；第三卷翻译了1983年李准、丁振海《毛泽东文艺思想新论》一书中的两篇论文<sup>④</sup>。值得一提的是，译者李腾渊原本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整体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出于对韩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对个人世界观的探索，开始关注中国近现代史和现代文学作品，继而重读毛泽东著作并开始翻译<sup>⑤</sup>。

1989年9月，知行（Amkwaham）出版社出版了《党的建设》一书。该书翻译自日本东方书店1967年出版的同名日文书，是对毛泽东重要著作中关于党建的内容按照主题进行的节选和重编<sup>⑥</sup>。全书共分17章，主题分别是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和路线，党的领导作用、基本组织和党委制度，党的干部、民主集中制、党内斗争，以及党内的思想教育、党的作风和整风运动等。韩文版译者金世恩（音译）在翻译时参考和对比了中文原著<sup>⑦</sup>。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还有一些编译文集中收录了毛泽东的著作。1986年，四季出版社出版了名为《文学理论与实践》的译文集。该书分为“欧洲篇”“中国篇”和“韩国篇”，其中“中国篇”收录了朴宰雨翻译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时韩国仍然处于军事政权的高压统治下，译者为了保护自己，在译文集中使用了笔名“赵星”<sup>⑧</sup>。另外，1989年出版的两种编译文集中也收录了毛泽东的文章。其一是《文学与政治——现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其中收录了金宜镇翻译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该译文集从属于“中国现代文学全集”，编译方针侧重于体现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前期中国革命与文学的关系<sup>⑨</sup>。其二是汎友社出版的《中国革命论》。这是一部毛泽东和斯大林著作的合集，包括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以及1926年11月30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下属中国委员会上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报告《论中国革命的前途》。译者为朴光钟（音译）。书的附录部分翻

① 三卷的原文均选自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毛泽东著作选读》。

② 参见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韩〕李腾渊译，首尔：协力出版社，1989年，第101-117、119-133页。

③ 参见毛泽东：《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韩〕李腾渊译，首尔：协力出版社，1989年，第241-264、265-287页。

④ 参见毛泽东：《延安文艺讲话·反对党八股》，〔韩〕李腾渊译，首尔：协力出版社，1989年，第101-116、117-127页。

⑤ 李腾渊（1955-），韩国全罗北道人，1991-2009年任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参见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韩〕李腾渊译，首尔：协力出版社，1989年，第136页；《李腾渊教授荣休纪念访谈录——从小说到文学史，连接“传统与转换的视野”》，《中国小说研究会报》2019年第1期。

⑥ 日文版的编译者是浅川谦次。参见何明星、江蓝：《毛泽东著作日文版的翻译、出版和发行》，《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0期。

⑦ 金世恩（1962-），首尔人，翻译该书时是成均馆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参见毛泽东：《党的建设》，首尔：知行出版社，1989年，第4页。

⑧ 参见李大可、〔韩〕全炯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1980年代韩国的译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0期。朴宰雨生于1954年，20世纪70年代上大学期间曾因参加反对朴正熙军事独裁的进步学生运动而被捕入狱。1983年成为韩国外国语大学汉语系教授后，他又积极参与“全国教授协会”反对全斗焕军事独裁政府的活动。历任“韩中文化论坛”组织委员长、韩国外国语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中韩合作主办的季刊《当代韩国》的韩方负责人、韩国中语中文学会会长和国际鲁迅研究会会长等职务。

⑨ 参见李大可、〔韩〕全炯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1980年代韩国的译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0期。

译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22 周年的《解放日报》社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1943 年)<sup>①</sup>。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全人出版社于 1989 年和 1990 年分别出版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 1986 年新编本) 的上下册, 韩文书名为《毛泽东选集 I》和《毛泽东选集 II》, 收录了 1921—1965 年各个历史时期毛泽东最重要的 68 篇著作。译者李熙玉是著名的中国政治研究专家<sup>②</sup>。

20 世纪 80 年代, 尤其是 1989 年, 多家出版社同时翻译出版了多部毛泽东著作。其中部分作品还出版了多种译本, 比如, 毛泽东诗词作品至少有 4 种译本,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完整译文也至少有 4 种。再加上选集新编本的翻译出版, 可以说是掀起了毛泽东著作翻译和出版的高潮。这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国际政治形势、朝鲜半岛局势和中韩两国国内情况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有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中国对外交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 将改善与近邻韩国的关系列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韩国的对华方针也发生了变化, 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谋求与中国和美、苏、日等大国一起合作解决朝鲜半岛问题。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 经济因素在各国外交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中韩两国在经济上互补性强, 韩国渴望中国的巨大市场, 中国需要韩国的投资和技术<sup>③</sup>。因此, 为了深入了解中国, 韩国学者对中国研究的热情进一步提高。

### 三、以专业学术研究为主的阶段 (1990 年至今)

主导 20 世纪 80 年代韩国社会主义和民主化运动的核心力量主要有两种——民族解放派 (NL, National Liberation) 和民众民主派 (PD, People's Democracy)。这两个派别在理念上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和对立, 对朝鲜的态度和认识也不同。随着民主化运动的成功, 对于接下来的运动路线, 两个派别的分歧越来越大。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 民族解放派和民众民主派都陷入了组织和影响力双重衰退的境地。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民众民主派。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推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众民主派受到了巨大的冲击。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朝鲜爆发了饥荒, 并开始开发核武器, 这让把朝鲜看作革命理想模式的民族解放派也不得不面对内部人员流失的惨境<sup>④</sup>。整体来说, 在一些传统社会主义政权陷入困境的国际大背景下, 韩国进步力量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景感到迷茫, 对毛泽东著作的翻译热情有所减退。

1992 年 8 月中韩正式建交。建交后两国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发展迅速, 韩国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对中国的关注日益增加。在这种背景下, 对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出版和研究作为中国学研究的一部分, 进入以专业学术研究为主的阶段。

① 参见斯大林、毛泽东:《中国革命论》, [韩] 朴光钟编译, 首尔: 汎友社, 1989 年, 第 7-8 页。

② 李熙玉 (1960-), 政治学博士, 韩国成均馆大学政治外交系教授、成均中国研究所所长、国家战略研究生院院长, 知名中国政治研究专家。出版了《中国对新社会主义的探索》(2004 年)、《中国政治论》(2005 年)、《中国的国家大战略研究》(2007 年)、《中国崛起与中韩关系》(2008 年)、《东亚地区主义与中韩 FTA》(2009 年)、《中国模式论》(2010 年)、《转换期的中国政治体制》(2012 年)、《中国能否走向民主》(2013 年)、《China Handbook》(2014 年)、《中国对新民主的探索》(2014 年)、《中韩关系的重构》(2014 年)、《韩中日三国关系》(2015 年)、《中朝关系解析》(2015 年) 和《一带一路解析》(2015 年) 等多部关于中国政治、中韩关系的专著和译著, 发表论文百余篇。参见《毛泽东选集 I》, [韩] 李熙玉译, 首尔: 全人出版社, 1989 年, 第 5-6 页。

③ 参见石源华:《简论中韩建交的历史背景》, 《外交学院学报》1995 年第 1 期。

④ 参见 [韩] 安仁焕:《韩国进步政党运动的分裂、统一过程及其原因分析》, 《韩国哲学论集》第 65 辑, 首尔: 韩国哲学史研究会, 2020 年, 第 152-153、162 页。

1994年8月,韩国中文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由韩国昌原大学行政系教授金桢桂<sup>①</sup>和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教授许昌武共同翻译。该书是一本毛泽东军事方面著作的合集,选取了《毛泽东选集》中关于军事的内容<sup>②</sup>。另外,继1989年李腾渊译本之后,《实践论·矛盾论》的第二个韩文本——金胜一译本于1994年10月由汎友社出版<sup>③</sup>。书中除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还收录了《新民主主义论》<sup>④</sup>。

进入21世纪,《毛泽东选集》四卷本陆续翻译出版,第一、二卷分别于2001年和2002年出版,第三、四卷分别于2007年和2008年出版。这套书的中文原书是199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韩文版由汎友社出版,译者是金胜一。当时在韩国已经开始倾向于用新的方式标记中国的人名和地名等专有名词,传统的方式是用汉字所对应的韩文来标记,新的标记方式则是把中文译名与其他外文译名同等对待,按照其原语发音进行音译。但是,在这套书里译者沿用了传统的方式,因为大多数人名、地名和事件名称的汉字标记是当时大家更为熟知和惯用的<sup>⑤</sup>。

2002年1月,韩国楼院(Darakwon)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毛泽东自传》(汪衡译,2001年),韩文书名为《毛泽东自叙传》。《毛泽东自传》中文版本繁多,目前发现和保存完好的版本至少有30个以上<sup>⑥</sup>,可见当时该书在中国国内受欢迎的程度。其中汪衡译本于1937年11月1日出版,早于《红星照耀中国》的中文版(1938年2月),是出版时间最早、影响最大的译本。促使楼院出版社把这一中文译本翻译成韩文的最重要原因是,汪衡译本的书稿在出版前经过了毛泽东的亲自修改。韩文版的译者南钟镐是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政治。为了便于读者理解,除中文原书的内容以外,译者用了相当大的篇幅介绍了该书的时代背景,并对文中出现的人物、事件、团体和刊物等一一进行了详细说明<sup>⑦</sup>。也就是说,这个译本跟前文所述的申福龙译本一样,非常重视学术性。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韩国出版了3种毛泽东诗词的译本。其中2004年4月草色(Pulbit)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的诗与革命》由时任韩国建国大学教授孔冀斗翻译和解读。他是韩国学术界中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持肯定评价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主导组建关于毛泽东研究的学会组织<sup>⑧</sup>,出版了《毛泽东思想论》等学术著作<sup>⑨</sup>。孔冀斗自称对于诗歌研究是门外汉,他对毛泽东诗词进行翻译并解读的目的是把这些作品作为研究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原始资料。孔冀斗认为,“毛泽东的诗词不是平

① 金桢桂(1947-),韩国庆尚南道人,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博士,曾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烟台大学、黑龙江大学等国内高校担任客座教授或研究员。金桢桂于20世纪90年代前期在平民社出版了《中国的最高领导层:Who's Who》(1990)、《中国的对外经济法》(1992)、《中国的权力结构和实力精英》(1993)和《中国政治论》(1995)。进入21世纪,又出版了多部中国学研究专著。

② 参见《毛泽东的军事战略》,〔韩〕金桢桂、许昌武编译,大邱:中文出版社,1994年,第3页。

③ 该书多次再版和重印。1994年10月1日初版第一次印刷,2004年9月25日初版第三次印刷,2009年3月25日第二版第一次印刷,2015年9月10日第三版第一次印刷。参见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韩〕金胜一译,坡州:汎友社,2015年。

④ 此外,2004年4月青蓝思想社出版的《政治理论》一书中收录了《实践论》(选自《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由史学家柳永博翻译。该书的主体部分是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J. Laski)的政治语法(*A Grammar of Politics*)一书的节选,书的后半部分介绍了毛泽东创作《实践论》的背景,并翻译了《实践论》全文。附录部分介绍了毛泽东诗词的概况,并对其诗词代表作《长征》进行了翻译和评析。参见哈罗德·拉斯基、毛泽东:《政治理论》,〔韩〕柳永博编译,首尔:青蓝思想社,2004年。

⑤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4卷,〔韩〕金胜一译,坡州:汎友社,2001、2002、2007、2008年。

⑥ 这还不全部包括这些版本的再版本和翻印本。参见丁晓平:《〈毛泽东自传〉源流考》,《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1期。

⑦ 参见《毛泽东自叙传》,〔韩〕南钟镐译,首尔:楼院出版社,2002年,第17页。

⑧ 参见〔韩〕李承熙:《现况与展望: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在韩国》,刘中树主编:《〈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第十五辑暨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论文汇编》,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0页。

⑨ 参见〔韩〕金忠烈、孔冀斗:《毛泽东思想论》,首尔:日月书阁,1985年。

凡的文学作品，而是革命者生涯的真实写照”<sup>①</sup>。该书是在韩国出版的毛泽东诗词译著中收录作品数量最多的，共75首诗词，分为“1909—1920年：理想与革命”“1921—1949年：民族与革命”“1949—1976年：国家与革命”和“人间爱与革命”四个部分。

另外两种译本是由中国朝鲜族译者翻译的。一种是文苑出版社（Monwonbook）于2000年出版的《毛泽东诗集》，由刘振成（音译）编译，该书附录部分选取了部分毛泽东诗词手迹<sup>②</sup>；另一种是2007年4月30日由多山书店（Dasanbooks）出版社发行的《如歌言语，似舞征服》，由张石万编译，书中的31首作品选自《毛泽东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和《毛主席诗词》（外文出版社，1979年）。全书分为“举杯洒向滔滔江水”和“想问你想去哪里”两章，每首诗都包括四部分，即毛泽东亲手笔迹、韩文译文、中文原文以及详细的背景说明和解读。在译者序言前增加了《毛泽东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和毛泽东的照片，附录是毛泽东年谱<sup>③</sup>。

2008年8月，平民社出版了郑次根<sup>④</sup>和金桢桂合译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该书翻译了《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6篇著作。译者认为，这些作品“可以称得上是现代中国政治哲学之精髓”<sup>⑤</sup>。

2009年1月，熊津（Woongjin Thinkbig）出版社出版了名为《实践论·矛盾论》的毛泽东著作。全书共12章，除《实践论》和《矛盾论》以外还收入了毛泽东的其他10篇著作<sup>⑥</sup>。书中还翻译了斯洛文尼亚哲学家和作家齐泽克写的长达40页的解读性前言，名为《齐泽克诠释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译者为卢胜英（音译）。在人名和地名的标记方面，以按照现代汉语的发音音译的新标记方法为主，但是像“曹操”“赤壁”这种近现代以前的名称仍沿用韩国人熟悉的汉字音标记法<sup>⑦</sup>。此后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韩文译本基本上都遵循了这一原则。

2010年至今，在韩国出版的毛泽东著作有3种。一是2015年耕智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箴言》，该书是从《毛泽东选集》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毛泽东文集》1—8卷（人民出版社，1993—1999年）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1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1998年）中选取了360条名言警句，分为“观世”“正己”“待人”和“处事”四个部分<sup>⑧</sup>。该书译者金胜一是耕智出版社的社长，也是汎友社版《毛泽东选集》的译者。耕智出版社出版了大量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的图书，也包括一些我国的外宣图书。

二是学古房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毛泽东主要文选》。这本书实际上是李腾渊在1989年翻译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6篇文章的修订版。当时协力出版社是分三卷出版的，本次学古房出版社将其合为一本。译者在序言中阐述了重新修订出版的原因：“现在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强国，而韩国在

① 《毛泽东的诗与革命》，〔韩〕孔冀斗编译，首尔：草色出版社，2004年，第6页。

② 参见《毛泽东诗集》，刘振成编译，首尔：文苑出版社，2000年。

③ 参见毛泽东：《如歌言语，似舞征服》，张石万编译，首尔：多山书店，2007年。

④ 郑次根为韩国昌原大学中国学系教授，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中国山东大学研究教授和客座教授，2009年荣获山东省政府颁发的“齐鲁友谊奖”。

⑤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韩〕郑次根、金桢桂译，首尔：平民社，2008年，第6页。

⑥ 其中包括新中国成立前的3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反对自由主义》，另外7篇是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著作：《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民》（1955）、《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1956）、《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1958）、《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1958）、《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1963）和《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

⑦ 参见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韩〕卢胜英译，首尔：熊津出版社，2009年。

⑧ 参见《毛泽东箴言》，〔韩〕金胜一译，坡州：耕智出版社，2015年，第4页。

现在和将来都与中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全面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特征。”尤其是在政治上，中国一直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核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如果想准确地判断中国政治的本质和方向，首先有必要了解毛泽东的政治和思想观点”<sup>①</sup>。

三是2023年3月开放书院（Yeollinseowon）出版的《毛泽东的诗》，由韩国诗人赵珉浩（音译）翻译。中文原书为1976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原书共收入44首作品，译者选取了新中国成立前的22首。在译著中，原文以简体和繁体两种汉字呈现，方便不同读者阅读<sup>②</sup>。

综上所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出版了《毛泽东选集》（四卷）全译本和十余种其他单行本或合编本。值得注意的是，随着1993年金泳三民选文人政府的成立和民主化在韩国的推进，韩国民众经历了认知上的巨变，由“独裁-民主”的二元论框架逐渐转变为“基于民主的多元话语”形态。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韩国社会中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和民主化运动一代产生了很大的差异。现在四五十岁的民主化运动一代基本上是把“民主”“统一”和“进步”理解为同一个范畴。而年轻一代最为重视的则是“公平的竞争”和“对结果的正当报偿”<sup>③</sup>，这在2019年韩国法务部长官曹国的辞职事件中充分体现出来。因此，现在的韩国年轻民众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的进步青年那样渴望从进步书籍中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毛泽东著作翻译出版的活跃反映了当时韩国民众渴望解决社会问题的心理，近年来毛泽东著作翻译出版的主要特征则是以学术研究为中心，其主要表现为大部分译者是从中国学研究的学者。

从上述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空白阶段，到20世纪80年代“毛泽东热”的兴起，以及20世纪90年代后进入以专业学术研究为主的阶段，不难看出时代因素对毛泽东著作在韩国的翻译和传播起到的作用。

#### 四、结 语

本文初步梳理了毛泽东著作在韩国翻译和出版的历史。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韩国一直处于军事独裁的威压统治下，社会主义思想和民众的自由受到严重压制，毛泽东著作被列为禁书，其翻译和出版处于空白状态。随着韩国民众民主化意识的增强，反对独裁政权的呼声越来越高。由进步知识分子和学生主导的民主化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进一步向工人和普通市民阶层扩散，韩国社会对进步思想的需求带动了20世纪80年代“毛泽东热”的兴起。当时韩国社会问题激化，民主化思潮涌动，进步力量希望通过研究毛泽东的思想和政治实践寻求解决韩国社会问题和变革的途径，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呈爆发式增长。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而中韩建交增加了韩国学术界对中国的关注，毛泽东著作在韩国的翻译和出版进入以专业学术研究为主的阶段。总体来说，毛泽东思想被认为是解决韩国社会问题所需要的主要思想理论之一，因此虽然毛泽东著作也有被列为禁书的特殊时期，但对其的积极译介和传播仍冲破了重重障碍，占据了主流。这是历史文化因素和时代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历史文化角度来看，中韩两国在地理上是近邻，具有悠久的文化交往历史。尤其是在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以后，大批独立运动志士流亡中国，在上海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1945年朝

① 《毛泽东主要文选》，〔韩〕李腾渊译，高阳：学古房，2018年，第6-7页。

② 参见《毛泽东的诗》，〔韩〕赵珉浩译，首尔：开放书院，2023年。

③ 参见〔韩〕安仁焕：《韩国进步政党运动的分裂、统一过程及其原因分析》，《韩国哲学论集》第65辑，首尔：韩国哲学史研究会，2020年，第157、165页。

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马上进入了毛泽东著作翻译和出版的活跃期。这一现象的出现是两国人民共同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延续，也是当时朝鲜半岛人民谋求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体现。

时代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毛泽东著作被列为禁书的时代是朝鲜半岛作为东西方冷战核心区域的特殊时期。朝鲜半岛的南北分裂和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中韩两国进入了长达30多年的敌视和对立时期，虽然该时期“毛泽东热”席卷全球，但在韩国政府的严格控制下，包括毛泽东研究在内的所有关于中国大陆的研究都被视为禁区。

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的思想和著作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韩国社会以及普通民众对作为重要周边大国的中国一直保持高度的关注。因此，尽管随着时代的不断变换，各个时期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出版与传播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但对其进行译介和传播必定成为常态。从这个角度来看，20世纪80年代韩国出现的毛泽东翻译热是从特殊时期回归了正常的文化交往，可谓是民心所向。而20世纪90年代中韩建立外交关系以后，这种文化交往迅速发展，包括毛泽东研究在内的中国学研究在韩国全面兴起，相关领域涌现出大批专家和学者，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至今方兴未艾。

#### 参考文献：

- [1] 李捷主编：《毛泽东著作辞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
- [2] 尚庆飞：《国外毛泽东学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 [3] 何明星、江蓝：《毛泽东著作日文版的翻译、出版与发行》，《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0期。
- [4] 〔韩〕赵诚出：《韩国印刷出版百年》，首尔：宝晋斋，1997年。
- [5] 〔韩〕朴钟邻：《解放后马克思主义原典翻译与朝鲜左翼书籍出版协议会》，《历史文化研究》2017年第1期。

（编辑：荀寿潇）

（上接第8页）走向“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全新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sup>①</sup> 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解决一系列国内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并在实践中形成中华民族独特的标识，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推进中华民族完成伟大复兴历史重任。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
- [3]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编辑：荀寿潇）

<sup>①</sup>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7页。